

# 历史视域下的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编者按：2013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10月18日，《历史研究》编辑部在京主办“历史视域下的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研究员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原所长黄宏教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陈雪薇教授等40余位学者宣讲论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也向研讨会发来论文。我们从会议论文中选取五位学者的论文进行了编辑，组成笔谈刊发。其他学者的文章，经筛选编辑后，分别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科学报》。正如高翔研究员在致辞中所说，毛泽东同志为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没有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我们希望这组笔谈有助于人们从历史与时代的制高点出发，科学认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从而更加牢固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 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历史任务的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 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两大历史任务。其一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建独立、和平、民主、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其二是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围绕着这两大历史任务，先后形成两条正确道路，一条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伟大历程中，毛泽东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从承上来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开辟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道路，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阶段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从启下来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阶段的征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本文着重论述毛泽东是如何开辟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道路的。

毛泽东是在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中开始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的。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内，不少人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中心城市暴动。毛泽东却决心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国民党政府统治力量薄弱的边界地区，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重新探索。

在这一艰苦卓绝的探索中，毛泽东抓住不同的历史机遇，成功地闯过五大关口，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 一、闯过道路关，开辟中国革命道路

9月9日，既是毛泽东逝世的日子（1976），也是他的事业有了新起点的日子。这就是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然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十天之后，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湖南浏阳县的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起义失败后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这次会上争论很激烈，多数人认为要继续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先取浏阳、再攻长沙。经过一夜的讨论，毛泽东终于说服了大家，决定直面敌强我弱的现实，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次转兵，奠定了毛泽东开辟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起点。这时，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已由5000余人锐减到1500余人。

从表面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了，但是由此开始了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全国胜利的新探索，产生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以中心城市暴动为起点，而是以农村作为长期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和中心，经过长期积累和力量对比由量到质的转变，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的伟大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能从失败中找到通向胜利的道路，他能从当前发生的具体事件中察觉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能将自己的认识转化为整个革命集体自觉的行动。

在随后的几年里，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先后完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作于1928年10月）、《井冈山的斗争》（作于1928年11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于1930年1月）等著作，系统论述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论述了中国革命在农村点燃的星星之火迟早会变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燎原之势的历史必然，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尽管这时毛泽东还未处于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而且中共中央依然还在上海，毛泽东开辟和代表的这条道路后来还不断遭到质疑和非议。但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问世，已成为客观事实。不但蒋介石逐渐把“围剿”的重心转移到了中央苏区，而且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遭到严重破坏后，也不得不把重心向中央苏区转移。这些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它昭示着只有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才能把中国引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未来。

周恩来作为主要当事人和见证人，曾在1944年3月《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这样回顾这段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程：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

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sup>①</sup>

## 二、闯过战争关,形成武装斗争法宝

道路问题初步解决后,历史又提出了打大规模歼灭战的问题。毛泽东抓住蒋介石接连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创造的历史机遇,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创造出人民军队独特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涉足战争之初,并不懂军事,也没有上过正规军校。他自己说,他学习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井冈山,不仅是毛泽东开辟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地方,也是毛泽东比较系统地展开军事斗争实践的第一个舞台。他学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后来,又发展为十二字诀:“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到了毛泽东和朱德井冈山会师后,又共同总结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sup>②</sup>

毛泽东十分看重十六字诀,认为红军后来的全部战略战术和作战原则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说:“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sup>③</sup>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是一个单纯为了打仗的军事武装,还要担负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革命政权的任务。这就是当时毛泽东经常强调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设革命政权“三位一体”。在毛泽东的培育下,中国共产党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有了很强的局部执政的意识,由此决定了只有它有能力创建新中国。

## 三、闯过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关,形成统一战线法宝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前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确定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不但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

①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9页。

②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29、232、243页。

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4—205页。

胜利，而且成功推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不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上层和部分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要求一致抗日。在此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一到陕北，就立即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重大调整。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肤施会谈后，中共中央又逐步作出了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方针的决定。随后，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的进一步会商，终于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具有很强的两面性。在中日民族矛盾面前，一方面，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压和侵略锋芒下，他们具有抗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引诱下，他们又具有动摇性。在国内阶级矛盾面前，一方面，他们亡共灭共之心始终不死；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贸然反共而背上“其豆相煎”的千古骂名。

1941年1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是这种两面性的集中表现。起初，毛泽东提出要做好最坏的准备，甚至要准备出现第二个“四一二”反革命事变。随后，经过“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斗争，使得国共两党的政治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

通过“皖南事变”的斗争，毛泽东得出几条重要的结论。其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地位。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叛变投降，也绝不会造成1927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其二，指导国民党政府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作战，不积极反汪、反汉奸，有时还与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其三，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如果我们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其四，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

经过整个抗日战争的实践，毛泽东系统地验证了中国广大的中间阶层乃至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特性，掌握了中国各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底线，从而为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策略基础和理论基础。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的运用，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 四、闯过农村建党关，形成党的建设法宝

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革命道路发展的中心也在农村。这就遇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如何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里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当时，共产国际认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成分不纯，依据就

是工人成分过少,农民成分过多。而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正是抓住中国近代社会的这一基本特点,从这里起步,开始探索的。

1929年12月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的奠基之作。当时,如何把广大的小生产者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着重强调要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从此,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就成了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大特色。

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在党的建设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在这次整风中,毛泽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把整风运动的聚焦点放在整顿党的作风上。这是因为,党的作风,是全党包括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它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党的行动中的客观表现和形象反映。抓住党风,也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关键,就能把思想教育成果渗透到每个党员的行动中去。因此,延安整风又被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

通过延安整风,逐渐培育起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还创造出整风这种实行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的好办法。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独创。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里还讲过一段名言:“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sup>①</sup>这是唯物史观贯彻到党的建设学说上的必然结论。

## 五、闯过中国革命决战决胜关,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抓住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丧失民心、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机遇,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入手,成功解决了决战决胜问题,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再次面临内战危机。这是由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反共立场造成的。当时,经过了长期抗战的中国人民,人心思定。毛泽东审时度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赴重庆谈判,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各民主党派面前昭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建国的诚意。随后,又围绕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同蒋介石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这些斗争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内战爆发之前,就在道义上赢得了主动,争取了民心。

在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爆发以后,毛泽东胸有全局,沉着应对,精心组织了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的军事斗争,并抓住时机指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防守的态势,直接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内。随后,又抓住敌我力量对比的关键时刻,组织实施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于长江以北,为渡过长江、占领南京、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条件。这以后,

<sup>①</sup>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页。

全国解放只是时间问题了。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也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的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表明国民党政权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告诫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如果我们只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而在工商业政策、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上犯了错误，同样也会使革命半途而废。为此，毛泽东重申党的各项土地政策，完善和发展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严肃纠正各种“左”倾错误，并适时提出“五一口号”，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炉火纯青、最为成熟、最为自如的时期。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sup>①</sup> 这是公允之论。

## 毛泽东选择“主义”的三重维度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李维武

1918年至1920年，是毛泽东上下求索选择“主义”的时期。这一“主义”的选择过程，在1921年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得出了最后的结论。这次会议从元旦开始一连开了三天，所讨论的主题就是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主义”，以此来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指导思想。会议讨论的问题和发言的内容，经毛泽东在这年春季整理，撰写并铅印成《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这次报告记录了该次会议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和会员围绕“主义”问题的论辩与选择。其中，毛泽东在会议第二天的发言尤其重要。他首先列举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主义”——“1. 社会政策；2. 社会民主主义；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 无政府主义”，进而分别予以评论、加以考量，得出结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sup>②</sup> 中国历史的进程已经证明，毛泽东对“主义”的这一选择，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新民学会，以至对现代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深入理解毛泽东的这一历史性选择，对于正确评价他的历史功绩和影响有重要意义。

### 一、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毛泽东在得出这个结论时，有哪些因素起了关键性作用呢？这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说，无

①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5页。

②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